



桑金伟 文/摄

在厚重的耕读文化中，如今最易见到的要数“耕读传家”的门楣和楹联。它另有“耕读世家”“耕读继世”“耕读育贤”“耕读书香”等不同的表达，更简略一点的表达还有“耕读”“耕且读”等。

余姚市历山村历史悠久，村上的张氏“廨记”原是个大户，廨记大门上的横批是“耕读世家”，两边石壁方柱的楹联是：“派溯华阳承旧学，家傍舜岭效躬耕。”舜是余姚人的骄傲，也是躬耕远古的楷模。

如果说“耕读传家”是一种期盼，那么“耕读第”则是理直气壮地告诉众人“我家已成耕读的门第了”，故写“耕读第”的比挂“耕读传家”的少得多。陕西党家村是值得去一去的著名古村，在其众多古建筑中有座“耕读第”。其大门上的楹联文字也很牛：“信步沁水岸得于恕轩门中，问津桃花源失之渊明笔下。”“沁水”就在党家村旁，该是村民的母亲河；“恕轩”是党家村始祖党恕轩，他先农后商并成功。而陶渊明无疑是为人所推崇的耕读践行者。

勤俭是老百姓很听得进的词儿，于是“耕读”与“勤俭”成了

经典搭配。同样在党家村，我拍到一副楹联：“廿三代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读惟耕，四百载守祖宗一脉真传曰勤曰俭。”告诫子孙，正当出路只有两条：读与耕；守业的最好措施有两点：勤与俭。后来我在扬州个园又拍到一副楹联：“裕后有良图惟俭与勤，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

“耕读”也常与“忠孝”搭配。在荆州东门张居正故居的正堂上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据称，这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送给“一等人”张居正的。此外还有“耕读继世久，孝友传家长”等句。事实上，社会分工专业、细化后，很多人无须下地种田，作为体力劳动的“耕”字的涵义逐渐引申开去，常用来指代脑力劳动等其他方式。譬如出现“笔耕”“舌耕”的说法，产生了“以笔代耕，以砚代田”的文人。

早年的徽商十分重视自家中堂的布置，在安徽黟县宏村，我见到一副堂联：“善为玉宝一生用，心作良田百世耕。”自己的心田也要勤耕，很有禅学意味。在别处，又见出这样的楹联：“炊烟连白云清风读素简，长河流日月犁锄画良田。”同类的还有“光前须种书中

中国人对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所谓“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于是，耕读结合成了一种价值取向。

# 耕读传家 遗风在



兰溪游埠耕读家门上方的“耕读传家”。

粟，裕后还耕心上田”“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存一点，子孙耕”，它们都突破了实体的田亩耕作。

隋朝开科取士，标志着中国科举制度的实行，寒门终于有了平等进取的机会，只要肯奋力读书、文章写得好，就有可能为官做相，于是出现了“读书乐”“读书楼”“读书堂”“读书世胃”等一类的门楣、匾额、对联、堂名等。



郑氏宗祠大门内联“槐里诗书门第，杏坛礼乐名家”。

在江西吉安永和镇乡下，我拍到一个“读书堂”。堂匾下挂着“一世祖云子公”和“基祖开公”的画像，两边联曰：“读华章力遂先人宏愿，书壮语群开后世乐园。”“四书五经”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它是备考学子最重要的读本，也是历代儒客研学的对象，读诗书在“读”中可谓举足轻重。因此，除了“读书第”，还有“诗书第”等。在广东



沙湾镇有“诗书世泽”，广州钱岗村有“诗书开越，忠孝传家”，在贵州的云山本寨有“自有琴书增道气，只将诗句答年华”，在湖南的阳山村有“俎豆承先德，诗书裕后昆”等。

宁波莫枝的郑氏宗祠是东钱湖畔众多祠堂中最大的，近年作了修整，成为东钱湖畔重要景点之一。祠内正门上写着“槐里诗书门第，杏坛礼乐名家”，据说此联原还是朱熹题的。这座郑氏宗祠还有个“书带流芳”的门楣。在祠外的郑氏大房之前，我还见到了这样一副楹联：“荣阳书带永流芳，通德名门推望族。”“荣阳”是郑氏的郡望，“通德”是郑氏之堂号。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已臻完备，考试时往往“一篇作文定终身”。而作文总是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之格式为八股文。八股文虽屡遭诟病，然“文章千古事”，它就有这么重要！常见的一副对联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前者说的是读书，后者说的自然是作文。当然文章不仅仅指成篇的文字，也可指更广义的“学问”“才艺”甚至“奥秘”等。如常见对联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等。

我在各地拍到与“文章”有关的门匾（楣）有：永州柳子庙的“都是文章”，南浔丝业公会的“翻敲文章”，福建溪潭的“云汉文章”等。在江西吉州区钓源古村的农家，拍到的竟不是“耕读世家”而是“文章世家”。

文章是文人劳作的成果，“文林”是文人聚集的地方。可挂有“文林第”的房子，还真不多。2005年我在奉化裘村镇的杨村到吴江村一带遇上了“文林第”，院子是原建的，匾额是20世纪80年代后子孙修复的。今年，我在慈溪市龙山镇东门外村的王家祠堂内见到一块“明文林郎”的匾，拟复原新制。“明文林郎”应理解为明代的文林郎。“文林郎”为隋文帝时始置，明、清沿袭。

在古民居的窗棂上，还经常可以看到“渔樵耕读”的砖刻、木雕；在烟标收藏者手上，我见过20世纪40年代的耕读牌香烟盒纸；过去，苏州农村曾流传吴语山歌《渔樵耕读》……然而，深厚的耕读传统在20世纪后日渐消逝，这也许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性潮流。

耕，就是耕田、劳动、工作；读，就是读书、学习、求知。我想，在当下，耕读精神仍是可贵的。

# 从天一阁藏“和刻本”看中日书籍互鉴

顾 玮 吴央央

## 天一阁藏“和刻本” 内涵丰富

### 主讲人名片

刘云，天一阁博物院典藏研究部古籍保管员、副研究馆员，从事天一阁所藏古籍的管理、编目和整理工作。发表论文有《清代宁波书坊刻书考》《民国期间宁波印刷业考述》《天一阁博物馆馆藏和刻本述略》等。与人合著《天一阁藏清代珍稀稿本提要》。



天一阁博物院供图

什么是“和刻本”？天一阁博物院典藏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刘云解释：“和刻本是指日本翻刻的中国书籍和日本人编撰刊刻的具有中国古籍特征的书籍的统称。有的和刻本有日文注读。”

和刻本与中国古籍如何区分？刘云认为，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纸张，日本的和纸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纤维较长，但透明度较高，所以从背面看，一些和刻本的字迹会透出来；其次是看封皮，和刻本的封皮大多比中国古籍要厚，并且有些经过染色处理，有淡蓝色、黄色、米黄色或者砖红色等，整体比较淡雅。当然，和刻本基本上也采用线装形式，和中国古籍外观上差别不是很大。

关于和刻本，早在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中就有记载，晚清民国时期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记》和叶德辉的《郎园读书志》也有著录和记载，为研究中日图书交流提供了大量材料。特别是叶德辉编纂的《书林清话》，第一次对日本、朝鲜活字版做了总结性的研究。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和

长泽孝三合著了《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近年来，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入，和刻本研究也走向了深入。1995年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宝平主编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按经、史、子、集、从五部分类，收录北京图书馆等大陆68家公共、大学图书馆度藏的日本1912年以前刻印、抄写和校注的中国古籍3000余种，所以了解和刻本汉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天一阁的和刻本从何而来？刘云介绍，天一阁的和刻本主要来自宁波地方藏书家的捐赠，加上其他各种途径而来的新藏书，共180多种。其中包括甬上藏书家朱赞卿的旧藏69种，冯贞群旧藏27种，张季言焦斋旧藏8种，孙家淮蜗寄庐旧藏8种，杨容林清防阁旧藏4种，还有甬上著名中医徐余藻所捐医学文献5种。

天一阁藏和刻本以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翻印、刊刻出版的书籍为主，其中时间最早的是日本宽永二十年(1644年)译田庄左卫门刊刻的《武经七书直解》十二卷，最

晚的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相当于整个清朝时期。这些书涉及日本重要的书坊，如江户嵩山房、浪华书肆、玉枝轩等。

和刻本分两种，一种是和刻汉籍，即日本翻刻、重刻中国古代典籍，经史子集各个部类的书都有。另一种是用汉文字书写并刊刻的日本人著作。

天一阁藏和刻汉籍比较丰富。经部文献，从《周礼》到《春秋经传集解》都有。至于史部文献，日本人特别喜欢有借鉴意义的，有《通鉴纪事本末》《唐鉴》《名臣言行录》《瀛环志略》等书。子部文献，大部分为医学文献，唐宋金元明清时代的代表性医学著作有16种，可见日本在借鉴中国医学方面是非常用心的。同时，日本又是非常崇尚武士道的国家，故对兵学文献也非常重视，像《赵注孙子》《武经七书》等都有刊刻流传。日本是汉文化圈国家之一，他们也十分重视儒家文献的刊刻。天一阁藏和刻本儒家类文献有《臣轨》《群书论》《贞观政要》三种。像这些

## 中日书籍交流 快速双向

中日书籍交流之快速，令人称奇。刘云举例说：《宋朱晦庵先生名臣言行录》为崇祯十一年(1638年)古吴张采刊刻，29年后，日本风月庄左卫门翻刻行世；天一阁藏有日本元禄十年(1697年)柳枝轩刻本《韵府古篆汇选》五卷，是覆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武林陈氏刻本，两者仅相隔25年；日本弘化二年(1845年)修道馆刻本《韩非子》，则是根据清顾广圻覆刻宋乾道本再刻的，时隔27年；清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墨海书馆铅印出版了《地理全志》五卷首一卷，咸丰四年(1854年)又雕版印刷了第二编十卷。四年后，日本就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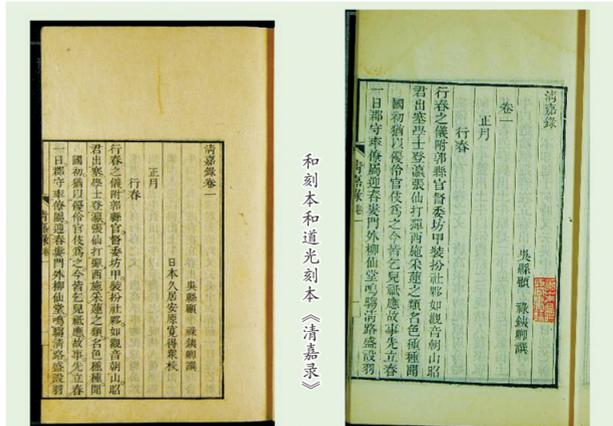
了全套《地理全志》。刘云说：“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即便如此，中日书籍的交流速度还是很快的。只要20年左右时间，中国出的书在日本就有刊刻行世。我所依据的还只是天一阁的藏品，如果放眼全国，说不定时间还能缩短。”

最能体现中日书籍交流速度的是《清嘉录》。刘云介绍，它是清顾禄撰写的有关江南岁时风俗的著作，道光十年(1830年)中国首刻，次年3月已经在东京书肆售卖，在日本广受欢迎。七年之后，《清嘉录》在日本翻刻行世。书前有有序，详细地介绍了该书在日流传及中日书籍交流情况，所

以它是中日图书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书籍的交流是双向的。日本保存了好多中国的典籍，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一些典籍在中国逐渐失传，在日本竟然还有保存。日本人对它们进行了整理，最有名的就是《佚存丛书》。此外，还有《全唐诗逸》，同样也是早期日藏汉籍回归的典型。

“关于中日书籍交流，背后的故事还是蛮多的。比如，明末应星撰有《天工开物》一书。第一次刊刻是在明崇祯年间，朋友徐氏为其刊刻的，清初福建商人杨素卿以徐本为底本翻刻了第二版，传到日本。日本本草学家见



书在中国国内长期失传，但在日本竟然保存得非常完好。集部文献9种，包括《陶渊明集》《唐王右丞诗集》、李攀龙《唐诗选》《柳文》、清林云铭撰《楚辞灯》等。特别是李攀龙的《唐诗选》在日本影响深远，被认为是“形成日本人中国文学修养和趣味之重要部分”的一部书。

除了刊刻中国典籍，天一阁藏日本人编撰刊刻的著作有31种。刘云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类是日本人整理研究中

国文献的著作；第二类是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为了向西方学习而编撰的西方历史的著作；第三类是日本的汉文诗文；第四类是日本人编撰的画谱和书法；第五类是日本人撰写的小说类的作品，如长田偶得的《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菅原忠俊的《菅家书则清演义》。其中天一阁所藏《菅家书则清演义》是日本文化七年(1810年)原刻本。而《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曾在晚清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起了激励作用。

原益轩在《花谱》和《菜谱》参考书目中列举了此书。1771年，日本书商柏原屋佐兵卫(菅原堂主人)发行刊刻了此书。1783年传入朝鲜。《天工开物》里提到了很多采矿、铸钱之法，并有违规之语，所以这部书在清乾隆时遭禁。虽在《古今图书集成》里就有部分内容，然而并不全。也就是说，后来中国流传的《天工开物》的各个本子，都是从日本影印过来的。没有日藏汉籍回归，国内很难见到这部书的全貌。”刘云介绍。

《一切经音义》的流传也非常有意思。有两部《一切经音义》，其一是一百卷的，由唐代释慧琳所撰；其二是流传比较多的二十五卷本，由唐释玄(元)应所撰。清代阮元在《四库未收书提要》中说，一百卷的《一切经音义》已失传。其实，他不知此书

在日本是有传世的，而日本的刻本竟然是从高丽传人的。一部《一切经音义》，就能看出东亚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概况。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自古和日本交流频繁，从天一阁所藏和刻本，可以看出中日文化交流的很多侧面。刘云说：“日本不仅接受了从中国汉文书籍的书写方式，还接受了中国汉文书籍的阅读方式和汉文书籍的刊刻方式；从更深层次来讲，日本不仅接受了中国的儒家文化，还接受并效仿了中国士大夫诗文唱和的风雅生活方式；特别是明治以来，日本人研究汉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更有意思的是，通过海上书籍之路，通过文化交流，中日两国在寻求政治变革的历史大潮中也互有借鉴。”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此为线上讲座。)